

中越關係嬗變與中老邊界問題的解決 (1971-1992)

• 馮一鳴

摘要：中老（中國、老撾）邊界問題的生成與解決，並非純係中老國家關係嬗變的產物，而是自始至終受到中越關係與中越陸地邊界對抗與緩和態勢的牽引左右。1970年代中期以降，中方賦予越蘇同盟以過於濃重的敵性色彩，從而將越南黨承襲自印度支那共產黨傳統的「印支聯邦」訴求視作嚴重威脅自身安全的「修正主義南方戰線」，因此竭力離間越老「特殊關係」，將老撾視作敵對國家，並在中越邊境衝突期間於中老邊境採取強硬措施。中方因受國際共運地區分工傳統等因素影響，一度將越老兩國等量處置，客觀上造成了中老邊界的不必要緊張，而憑藉對老撾黨獨立性的重新認識，加之中越關係的最終轉暖，中方於1990年代初主動提出解決中老邊界問題，此舉促成了中老邊界嗣後的長期和睦穩定。本文以1960年代以降中國對於印支革命與地區安全的總體考量特點為主線，從中越、中老兩組邊界問題的共生特性出發，分析中國處理對老關係和中老劃界的政策緣起，以及越南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關鍵詞：中老邊界 中越關係 越東戰爭 印支革命 越蘇同盟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陸地邊界總長約710公里。縱觀中國與其陸上鄰國的諸條邊界，中老邊界無論就其管控程度、穩定狀態、邊民流動以及治安情況而論，均堪稱難得的「模範邊界」。不僅如此，1990年代中老邊界的談判劃定過程亦屬相當順利，兩國政府對於邊界問題的解決結果均表滿意。就中老邊界問題的緣起而言，1885年法國迫使清政府訂立《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後，老撾於1893年10月淪為法國殖民地，這一歷史鉅變將中老邊界問題推上歷史舞台。自1893至1895年，中法雙方重點圍繞位於老撾北部與中國雲南交界處、本屬中國領土的猛烏、烏得兩地反覆交涉；清政府迫於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中國周邊國家對華關係檔案收集及歷史研究」（15@ZH009）階段性成果。

時局壓力，最終同意割讓上述兩地。1895年6月20日締結的《中法續議界務專條附章》對中老邊界作出相對明晰的分劃說明；中法兩國官員則於條約簽訂後迅速展開多輪勘界立碑活動，此舉在確認中老邊界諸段走向的同時，也為日後進一步解決邊境地區界務問題提供了實地信息基礎^①。

中老邊界自1991年兩國締結劃界條約以來，長期處於「保持穩定，時需鞏固」的較理想狀態，特別是與中越邊境「緩中存憂，時有糾紛」的情況及中緬邊境頻仍的跨境衝突與滲透活動相比，中老邊界在中國西南腹地面向印度支那半島的對外交往態勢中，堪稱難能可貴的無爭議安定域段^②。回溯中老邊界釐定的歷史過程，兩黨兩國的具體溝通協調頗為順暢，自始至終未出現明顯的利益糾葛與爭執熱點。然而，這並不意味着針對中老邊界問題的歷史考察流於平素扼要的泛論直敘。事實上，由於老撾人民革命黨（以下簡稱「老撾黨」），1950至1975年稱為「巴特寮」與越南共產黨（以下簡稱「越南黨」），1951至1976年稱為「越南勞動黨」長久以來的「特殊關係」，特別是自越南抗法（1946-1954）、抗美戰爭（1955-1975）以降形成的全方位同盟互動，中國無論處理與老撾的黨際雙邊關係，抑或單就中老邊界問題折衷協調，均離不開中越關係，特別是中國應對越南「印支聯邦」（越南黨將印支三國革命視為自己的傳統責任）歷史抱負的嬗變波折；中國共產黨自1950至1970年代因應越老「特殊關係」審度政策，客觀上直接決定了其處理對老關係的動機與實際效果。有鑒於此，欲釐清中國處理中老邊界問題的前奏與來龍去脈，就必須對中方之於越老同盟及「印支聯邦」戰略的互動關係作系統完備的歷史考察。

當前學界關於越南戰爭前後中老邊界問題的專論或旁涉研究寥寥無幾。關於社會主義陣營對老撾革命的應援態度，學界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學者利用美、英、法、蘇、越等國檔案材料，揭示了越老「特殊關係」的部分特質，提供了史實線索與文獻基礎。其中蓋杜克（Ilya V. Gaiduk）與奧斯倫（Mari Oslen）均立足蘇聯視角，大量運用俄國解密檔案，擇要梳理了老撾問題的緣起及1954年日內瓦會議解決印支三國獨立問題的主要經過。洪清源的編年體著作亦在一定程度上論及中國外交與中蘇關係變動對越南、老撾政策的影響。岡恩（Geoffrey C. Gunn）着力探究法屬印支殖民地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起源，並指出老撾黨通過在越南境內設立游擊基地，與越南黨前身的「越南獨立同盟會」建立起更富成效的合作關係，從而贏得較之國內其他民族主義勢力的相對優勢。高沙（Christopher E. Goscha）則從意識形態、文化及安全戰略角度考察越老關係，認為越南在老撾的強勢姿態直接影響了越南黨的「革命觀」，通過對老撾內戰（1953-1975）的介入，越南黨愈加將自身視作東南亞革命的先鋒領導力量。阮蓮芳在其著作中以相當篇幅回顧了1945年以降的越南援老革命歷程，指出越南不斷加大對老軍事投入，中國在老撾的活動空間受到愈來愈大的擠壓。翟強則提出，由於內戰中老撾親美政權威脅中國南疆，中方選擇支持梭發那·富馬（Souvanna Phouma）的中立派政府，同時建議老撾黨保存實力，通過日內瓦會議達成暫時妥協，從而保證越南利用胡志明小道加強對南越武裝鬥爭^③。

不過，上述研究仍多以鋪敘梗概為主，視角較為單一，且均未交叉運用中越原始材料，因而未能詳及中越在援老革命過程中的具體審度。有鑒於